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6 期
2004 年 6 月，頁 1-21
特邀稿件

大江匡房的「詩境記」－十一世紀日本人所寫的中國詩略史

後藤昭雄*

摘　要

大江匡房（1041-1111）是日本古代後期的代表文人，〈詩境記〉是他執筆的作品之一。這個作品以「詩境」的「境」之字意假想爲一個國家、空間，他的「詩境」敘述了作詩的情形。這種方法是模仿唐朝初期王績的〈醉鄉記〉。

雖然內容簡略，但這個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在於起於『詩經』，止於晚唐，它記述了中國詩史的發展。起於『詩經』，是指他從漢朝的連句、五言詩，從後漢、魏、梁到宋朝的變遷，依據〈毛詩大序〉〈文選序〉《文心雕龍》《宋書謝靈運傳論》等作品的表現而記述。有關唐朝當中，杜甫、章孝標、許渾、杜荀鶴、溫庭藴在日本的評價以及受容的情況做比較，他是值得探討的詩人。

這個〈詩境記〉雖然只是簡略的記述，但是他是可以理解十一世紀日本的文人對中國詩史的發展的作品，因此透過它的記述與其他詩文資料作比較，可以理解當時在日本的中國文學受容情形。

關鍵詞：詩境、〈醉鄉記〉、文體三變、六義、八病

* 日本大阪大學文學部文學研究科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safusa Oe's "Sikyoki"—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Written by a Japanes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Goto, Akio*

Abstract

Masafusa Oe (1041-1111)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literati in the later stage of ancient Japan. "Sikyoki", modeled on Wang Ji's "Zui Xiang Ji" (Records in a Drunken Stupor), talks about writing poems. Wang is a Chinese scholar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ang Dynasty.

Though it's very brief, the book records and nar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Book of Songs to the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this book,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Japan.

Key words: the level and the atmosphere of poetry, "Zui Xiang Ji" (Records in a Drunken Stupor), the three changes of the literary styles, the six rules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 eight flaws

* Professor of Osaka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江匡房の「詩境記」—11 世紀日本人の書いた中国詩略史

後藤昭雄*

要　旨

大江匡房（1041-1111）は日本の古代後期の代表的文人であるが、彼が執筆した作品の一つに「詩境記」がある。この作品は「詩境」を「境」の字義に即して一つの国、空間として仮構し、その詩境で詩が製作される様相を叙述しているが、この方法は初唐の王績の「酔郷記」に倣すものである。私がこの作品に注目するのは、簡略ではあるが、この作品が『詩経』に始まって晩唐に至るまでの中国詩史の展開について記述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詩経に始まり、漢における聯句、五言詩の起源、後漢から魏、梁を経て宋に至るまでの変遷を「毛詩大序」「文選序」『文心雕龍』「宋書謝靈運伝論」などの表現に依処しつつ記述している。唐代については代表的詩人の名を列挙しているが、その中には杜甫、章孝標、許渾、杜荀鶴、溫庭筠など、日本における評価、受容情況と比較しつつ検討すべき詩人が含まれる。この「詩境記」は簡略な記述ではあるが、十一世紀の日本の文人が中国詩史の展開をどのように理解していたかを示すものであり、その記述を他の資料と比較することを通して、当時の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受容の様相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キーワード：詩境、酔郷記、文体三変、六義、八病

* 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科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江匡房的〈詩境記〉
－－十一世紀日本人所寫的中國略詩史－－

後藤昭雄 著、黃秀敏 譯*

一、

大江匡房[1]（OOE NO MASAFUSA）（1041～1111）是日本的古代後期代表性的文人，在他的作品之一，有〈詩境記〉(《朝野群載》[2]卷三)。此作品是將「詩境」，就「境」之字義，虛構爲一個國家、空間，敘述詩是在該「詩境」中制作的情況。雖然簡略，但卻是記述始於《詩經》，而至晚唐中國史詩的展開之中國略詩史。

日本的古代後期之知識分子是如何地理解中國詩的歷史，欲透過閱讀〈詩境記〉來觀察。

首先出示〈詩境記〉之全文。

「夫詩境者、無水土山川、無人民戶邑、又不知在何方面、瞥然而至、倏忽而往、至其佳境、難中之難也、以翰墨為場、以感傷為俗、花月輸租稅、煙霞代封祿、桃李施不言之化、蘭菊飽惟馨之德、不聞風塵之変、不看露霧之侵、心動於中、言形於外、詠歌不足、故嗟嘆、嗟嘆不足、故不知手之舞足之踏、起於四始、創於六義、周南邵南者、風之始也、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詩三百篇、大概聖賢発憤之所作也、古詩之体、今則取賦名、聯句出於柏梁、五言成於李陵、自漢至宋、四百余載、詞人才子、文体三変、後漢之代、張平子為其魁師、魏文帝昔到其辺鄙、曹子建、王仲宣為先導、司馬氏之化、陸機、陸雲、潘安仁、左大沖，承為著姓、宋明帝、隋煬帝、並欲慰納、与其豪□、鮑明遠、薩道衡等争礼、遂不內属、梁時沈約

---

*後藤昭雄：日本大阪大學教授；黃秀敏：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兼任教師。

[1]大江匡房（OOE NO MASAFUSA）：平安後期的漢學者、歌人(和歌詩人)。大江匡衡的曾孫，稱爲江帥(GOU NO SOCHI)。仕於後冷泉、後三条和堀河三朝，正二位權中納言，有紀錄其談話的《江談抄》。

[2] 朝野群載（CHOUYAGUNSAI）：將平安時代的作品，按詩文、詔敕、宣命、對策、牒書、公文、吏牒等分類，編輯成的書。三善爲康編。永久四年（1116）之自序，原爲三〇卷，其中九卷散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造法律、以副音韻、後人祖述、又定八病八对、□上官儀輩避其半、唐太宗時掌其地、自今以後、王楊盧駱、杜甫、陳子昂之屬、□□其句、近世白楽天、元微之、改風易俗、新立政令、人大妙之、是為元和之体、章孝標、許渾、杜荀鶴、溫庭筠等相随之、□人作瑠璃台、苟定人階品、世不用之、我朝起弘仁承和、盛於貞觀延喜、中興於承平天暦、再昌於長保寛弘。広謂則三十余人略其英、莫不過六七許輩。」

二、

以下適宜地斷句來說明。

○夫詩境者，無水土山川，無人民戶邑，又不知在何方面，瞥然而至，倏忽而往，至其佳境，難中之難也。

那詩境是無水土山川，無人民戶邑，又不知在哪個方向。轉眼而至，疾速而去，要達到其佳境，卻是難中之難。

「詩境」在此「記」中，是附會於「境」之字義，架構爲一個空間、國家。像這樣把精神上的活動置換到一個空間，即此「記」的這個想法、結構，是連同〈詩境記〉這個標題，仿照初唐、王績[3]的〈醉鄉記〉的。下面引用〈醉鄉記〉從開頭到中途。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

是將醉意比擬爲「醉鄉」這一個空間，而綴文的作品。並且，此「記」在《文苑英華》[4]是被排列在卷八百三十三的「寓言」中，可以說此「寓言」之文字正充分地說明了此文章的性質。

〈詩境記〉的「無——，無——，又不知——」的文章結構，當

[3]王績(585-644)：隋、唐之文人。字無功，號東皋子。嗜酒，被稱爲斗酒學士。著有《東皋子集》。

[4]文苑英華：文集。一千卷。李昉等奉宋太宗之敕撰，成於 987 年。其意圖是繼《文選》之後而編纂的，收錄了梁末到唐代之文。爲宋代四大書之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也是仿照〈醉鄉記〉。

又，將「詩境」就「境」之字義，比擬爲空間的想法，也已經有先例了。

首先，關係到匡房。在記錄其言談的《江談抄》[5]中有如下的話題。

> 又大府卿談曰，仲題(秋未出詩境)斉名作，霜花後乗詞林裏，風葉前駈筆訳程，至于下七字，風之駈葉涉前駈之義，尤有興。霜花後乗，甚無以由。

以同題之句，另外在《作文大体》，有同樣有名的「不置関城終可去，縦無帰路欲妨行。」在《江談抄》，即在剛才引用的部分之前，引用了大江以言的「文峰案轡白駒影，詞海艤舟紅葉聲声。」因此最前面《江談抄》所引齊名的一聯，包含著「後乗」「前駈」「筆訳程」等之詞句，並將「詩境」比作一個空間來詠作，這是易理解之事。

又比這些一条朝[6]詩人晚一些，在永承 6 年(1051)3 月的《侍臣詩合》中，以「詩境惜暮春」之題歌詠的，有源隆俊的「遮月雲関風雅裏，駐花露駅酔吟程。」藤原資仲的「詠風強駐雲関裡，嘯月苦拘露駅程」的例子。「雲関」「駐」「露駅」「程」等之措辭，是將「詩境」以一空間來掌握，並以此爲關鍵字，制作相關語的。

○以翰墨爲場，以感傷爲俗。花月輸租稅，煙霞代封祿。

以翰墨爲場，以感傷爲俗。將花月輸作租稅，煙霞代爲封祿。

「以翰墨爲場」是將見於[劉]宋、謝瞻〈張子房詩〉的「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杜甫「壯遊」的「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等之詞分開使用。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作品分類爲諷諭詩、閑適詩和感傷詩。提到「感傷」畢竟還是會想起其「感傷」吧！此若按詩人自己的規定，則是「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随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與元九書〉，《白氏文集》卷二十八）。

---

[5] 江談抄（GOUDANSHOU）：由藏人（KUROUDO）藤原実兼筆錄大江匡房的談話。六卷。記載著平安中期以後的公事、摂関家、神佛和雜事等。

[6]一条天皇（ICHIJOU TENNOU）：第 66 代天皇。名懐仁（YASUHITO），是円融天皇的第一皇子。986 年即位，在位 25 年。（980~1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月花輸租稅」在「詩境」，是將「月花」以租稅繳納之意。「輸」是以「租稅」爲律令詞之相關語，而使用「令」之用語。「戶令」的「戶逃走條」作「凡戶逃亡，則……，租調代輸」，「田令」的「田長條」作「凡田租是準於國土收穫之早晚，自九月中旬起輸」。

在「詩境」作爲「租稅」被「繳納」的「花月」，是引起詩興的自然景物的代名詞，但將「花月」以這樣的東西來掌握，並將此和律令詞一起運用造句的先例，則見於匡房之曾祖父匡衡[7]的詩中。在其再度被任命爲尾張[8]守的〈冬日於州廟賦詩〉(《江吏部集》卷中)，有「洛下親朋莫拋我，欲塡月稅与花租」之例句。

「煙霞代封祿」，「煙霞」是與對義詞「花月」同樣地，是促使詩興的大自然之意。將「煙霞」如此吟詠的例子，早在菅原道真[9]「憶諸詩友兼奉寄前濃州田別駕」(《菅家文章》卷四)，有寄給島田忠臣的「君先罷秩閑多暇，日月煙霞任使令」。

又將「花月」和「煙霞」作爲對義詞的先例，則在匡房的曾祖父匡衡的「暮春応製」(《江吏部集》卷上）有「煙霞得境若応惜，花月有時誰不叨」。

○桃李施不言之化，蘭菊飽惟馨之德。

桃李施不言之化，蘭菊飽於惟馨之德。

將開在「詩境」的草木，並連同其化育萬物之德來說明。

上句是根據眾所周知《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列傳〉，太史公評所引用的諺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下句「馨」是香，《藝文類聚》卷八十一菊所收的晉代、王淑之的〈蘭菊銘〉，有「蘭既春敷，菊又秋榮，芳薰百草，色豔群英，孰是芳質，在幽愈馨」之例。「惟馨」是出於《尙書》[卷第十八]〈君陳〉有「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之詞。

○不聞風塵之変，不看露霧之侵。

---

[7]大江匡衡（OOE NO MASAHIRA）：平安後期的漢學者，歌人（和歌詩人）。文章博士。一条天皇的侍讀、侍從。著有《江吏部集》。（952~1012）

[8]尾張（OWARI）：舊國名，今愛知県西部。

[9]菅原道真（SUGAWARA NO MICHIZANE）：平安前期的學者、政治家。是善（KOREYOSHI）之子。詩文收於《菅家文章》、《菅家後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聞風塵之變，不看露霧之侵。

「風塵之變」是兵亂，《晉書》卷五十七〈陶橫傳〉，有「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露霧之侵」是指寒氣入侵身體生病。「詩境」本來就與戰亂、疾病無緣。

○心動於中，言形於外。詠歌不足，故嗟嘆。嗟嘆不足，故不知手之舞足之踏。

心動於中，言形於外。詠歌而不足，故嗟嘆。嗟嘆而不足，故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不用說，是根據被認爲是卜子夏所寫的〈毛詩序〉(《文選》卷四十五)，即所謂大序，敘述詩之定義的部分。

詩者至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起於四始，創於六義。

起於四始，創於六義。

「四始」是詩之四個起源，即風、大雅、小雅、頌，《詩經》之四個範疇。〈毛詩序〉作

>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也。

「六義」是詩的六個原則。這也是眾所周知，即同樣在〈毛詩序〉作「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而且，將「四始」和「六義」用作對偶的，《文心雕龍》〈明詩〉有「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的例子。《文選》卷五十〈宋書謝靈運傳論〉有「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之例。

○周南邵南者，風之始也。

周南、召南是風之始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南〉〈召南〉是《詩經國風》十五卷中，最初的二卷。在《詩經》的古注中將此二卷稱爲「正風」，其餘各卷稱爲「變風」，以作區別。在《論語》〈陽貨〉，也有孔子如次的話。

>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周南、邵南者，風之始也」一文，也是使用〈毛詩序〉的措辭，是將〈毛詩序〉接近末尾部分的「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和其開頭的「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繫連起來。

○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

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則足以戒。

解說詩的功用。這裏也是原封不動地使用〈毛詩序〉的「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以上，敘述詩的定義、起源和功用等之部分，全部借自〈毛詩序〉之措辭，安排並使用之。

○詩三百篇，大概聖賢発憤之所作也。

詩三百篇，大多是聖賢發憤之所作也。

在《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說明正因爲處於逆境，才有出色的著作產生之事。亦即使用了其舉例證明發憤著書之說，其中之一例「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自此以下，敘述詩的發展史。

○古詩之体，今則取賦名。

古詩之體，今則取賦之名。

在〈文選序〉，作爲「詩有六義」，舉出從「一曰風」到「六曰頌」。作爲「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之例，舉出「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亦即將詩之表現方法之名稱「賦」，現在卻作爲文體之名(賦)，原封不動地使用之。

○聯句出於柏梁，五言成於李陵。

聯句是出於柏梁，五言則成於李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句是根據《文心雕龍》〈明詩〉的「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後句則是根據《詩品》之序的「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柏梁」是漢武帝所築的柏梁台。《古文苑》卷八，收錄了元封三年（西元前108年），召集善於作詩的群臣於柏梁台，所製作的七言聯句。

○自漢至宋，四百余載，詞人才子，文体三変。

自漢至宋，四百餘年，詞人才子，文體三變。

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作「自漢至魏，四百餘人，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僅改變文字而已，並使用之。

將「辭人」改爲「詞人」，而「詞人才子」則根據〈文選序〉。

○後漢之代，張平子爲其魁帥。

後漢之代，張平子爲其魁帥。

是「三變」之一。「張平子」是張衡。「魁帥」是首領。即「詩境」所指的「國家」。

關於張衡，〈宋書謝靈運傳論〉，在略述發生以來的詩史中，說：「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文心雕龍》〈明詩〉，則在普遍觀察各時代，總結後，做總結，首先作「故平子得其雅」。又同在〈明詩〉，作「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

○魏文帝昔到其辺鄙，曹子建、王仲宣爲先導。

魏文帝以前到其偏僻地，曹子建、王仲宣作嚮導。

說是三變之其二在魏。「其偏僻地」是「詩境」所指「國」的邊境。文帝去那裡時，曹子建即曹植，和王仲宣即王粲做嚮導。亦即扮演了文運興隆，先驅的職務。《文心雕龍》〈明詩〉作「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

「陳思」是陳思王曹植，「王」是王粲。又，〈詩品序〉也作「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禎、王粲，爲其羽翼」。「平原兄弟」是指平原侯的曹植和其兄文帝曹丕。還有，在建安詩人當中，特別記載曹植和王粲的例子，則在前面的〈明詩〉，概觀各時代後，在總結的部分，說：「兼善則子建、仲宣」。又〈宋書謝靈運傳論〉，在具體地說明上述「自漢至魏」「文體三變」之中，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摽能擅美，獨映當時」，即爲此。

○司馬氏化，陸機、陸雲、潘安仁、左大沖，承爲著姓。

司馬氏一化身，陸機、陸雲、潘安仁、左大沖，承爲著姓。

是「三變」之其三。在司馬氏的晉代，此四人在「詩境」這個「國」中，是「著姓」。「著姓」是有名的門第。例如前面出現的張衡，在《後漢書》之傳中，作「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

關於陸機以下四人，〈詩品序〉作「爾後，陵遲衰微，迄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俱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其中，「二陸」是陸機和其弟陸雲；「兩潘」之一人是潘岳，即潘安仁；「一左」是左思，即左大沖。又，《文心雕龍》〈明詩〉，說；「晉世群才，稍入輕騎。張潘左陸，比肩詩衢」，是換陸雲改舉張協的。

以上，雖說是「文體三變」，但是作爲其典據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文體三變」以下，作「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對於說明如字面樣的「文體」，詩文風格之變化，在此敘述的只是三個文運之隆盛期。「文體三變」這個主題，與以下之論述呈現分離狀態，也逐漸成爲造成這樣的表現和內容不一致的原因。以上部分大致是根據中國的文學論書之論述所作的著述。

○宋明帝，隋煬帝，並欲慰納，與其豪□。鮑明遠、薩道衡等争礼，遂不內屬。

宋明帝、隋煬帝，並欲慰納，與其豪[ ]。鮑明遠、薩道衡等爭禮，終於不內屬。

「並欲慰納，與其豪□」，因有缺字，無法好好理解，但在後面還會敘述。「薩」與「薛」通用。

宋明帝是匡房的誤解，文帝才正確。文帝是第三代皇帝。鮑明遠是鮑照，鮑照在文帝的身邊曾是中書舍人。與此二人有關的記載，見於《南史》卷十三，〈臨川烈武王道規傳〉

> 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又，關於薛道衡，《隋書》卷五十七的其傳中，講述其與煬帝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判的地方，大概與此「記」之記述符合吧！

> 煬帝嗣位，轉番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頌略）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

文皇帝是煬帝之父。「魚藻」是《詩經》〈小雅〉之一篇，諷幽王之政事，追慕往古之武王的詩。對於弒父繼承王位的煬帝而言，「文皇帝頌」必定是極不愉快的頌詞。

記錄在《江談抄》如下的言談，是與「記」的這項敘述有密切的關係。

> 雖是賢人君子，但是文道之諍論和漢共有事也。宋明帝與鮑明遠爭文章之間，明帝其性甚以凶惡也。仍殺鮑明遠，因此作損。時人曰，文衰也云。隋煬帝與薛道衡爭文章之間，薛道衡遂被殺了云云。

匡房在此，也與在「記」同樣，把文帝和明帝弄錯了。但是正因爲是談話，更能傳達其旨趣。

在此，若思考此「記」的這條項之意思，則包含缺字的「豪□」，在「詩境」應該是豪家、豪門、豪雄，即文豪之意之詞。宋文帝、隋煬帝撫慰在這樣的「詩境」的豪家，欲引進其到自己的勢力下，但是他們卻不肯順從其意。「內屬」是投降成爲屬國。當然，是將「詩境」比擬作一空間，是符合此「記」之主題而挑選的文字。

○梁時，沈約新造法律，以副音韻。後人祖述，又定八病八对。□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官儀輩避其半。

梁時，沈約新造法律，以配上音韻。後人祖述，又定八病八對。〔 〕上官儀之輩避其半。

所謂「沈約新造法律」是指沈約主張四聲說。這是指在「詩境」的「法律」。

沈約主張四聲說之事，《南齊書》卷五十二〈陸厥傳〉，作

>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在日本，空海的《文鏡秘府論》[10]，首先在「序」作「沈侯劉善之後，王皎崔元之前，盛談四聲，爭吐病犯」。「沈侯」即沈約，「劉善」是隋、劉善經，「王」以下是唐代的王昌齡、釋皎然、崔融、元兢。而且，在天卷立「四聲論」之項目，詳細地論述，在該處說「宋末以來，始有四聲目，沈氏乃著其譜」，其著《四聲譜》之名也被舉出。

說明「八病」現存最古的資料是上述的《文鏡秘府論》。但是，空海在其著中詳細說明的不是「八病」，而是「文二十八種病」（西卷）。然而，又其二十八種病之中的第一到第八才是八病。即其八病是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傍紐、正紐之八種。而在〈詩境記〉之前後的日本著作中，有「八病」之記述的《口遊》《作文大体》，以及稍微後代的《二中歷》[11]所舉的「八病」，皆與此一致。

對於這樣確定的「八病」，「八對」卻是變化不定的。

首先在《文鏡秘府論》東卷，有「論対」之條項，在該條也舉出「二十九種對」。又，這是從中國的詩歌格式類取捨選擇而定的，是由好幾個群所形成的，其第一群也是與先前的詩病雖爲「二十八種病」，但是到八種形成一個群不同，這是以十一種形成一個群。在有「對」

---

[10] 『文鏡秘府論』（BUNKYOUHIFURON）：漢詩文之評論書，六卷，空海編著，約成於 819-820 年，取六朝及唐代詩文之評論和格式之樞要。是評論聲韻、體勢、對偶、文意、病和對屬等之書。

[11] 『二中歷』（NICHUUREKI）：類聚了掌中歷和懷中歷的書。據傳是平安末期算博士三善爲康之撰，其實是鎌倉末期之編。一三卷，是立了神代、人代、佛聖、大佛、乾象、坤儀、官職、醫方等八二目的辭典，是漢字的研究書。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的記述書中，《口遊》《作文大体》成簣堂文庫本則以「七對」舉出，提到「八對」的，則爲《作文大体》觀智院本和後來的《二中歷》。

上官儀是初唐貞觀期的詩人。他對詩病、對句持有一家之言。關於詩病，在《文鏡秘府論》西卷「文二十八種病」的第十五齟齬病，可看到引用「上官儀云，犯上聲是斬刑，去入亦絞刑」之事。關於對句則在[劉]宋，李淑的《詩苑類格》(《詩人玉屑》卷七所引）作「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可知其六對被引用之事。

○唐太宗時掌其地。自今以後，王楊盧駱、杜甫、陳子昂之属，口口其句。

唐太宗時掌其地。自今以後，王、楊、盧、駱、杜甫、陳子昂之屬，其句[ ]。

「其地」不用說即「詩境」。「王楊盧駱」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四人。將此四人以初唐武后時代的代表性詩人，如此地取其姓而齊名的，在《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楊炯傳〉已有用例，即仿照此。

> 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

陳子昂（661~702）是初唐的詩人，在時間上是在盛唐的杜甫（712~770）之前。

那麼，在此一短文中，欲敘述什麼呢？由於在最重要的地方，有脫落的部分，所以不明。

○近世白樂天、元微之，改風易俗，新立政令。人大妙之，是爲元和之體。

近世白樂天、元微之，改風易俗，新立政令。人大妙之，是爲元和之體。

「改風易俗」是將《禮記》〈樂記〉的「移風易俗」之措辭稍作改變來使用。白居易和元稹完成被稱爲「元和之體」的詩風之事，以改「詩境」的風格，新立政令來表現。「元和之體」在《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元稹傳〉，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自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為元和體。

○章孝標、許渾、杜荀鶴、溫庭筠等，皆相隨之。

章孝標、許渾、杜荀鶴、溫庭筠等，皆相隨之。

只有章孝標是中唐詩人，許渾以下三人皆是晚唐詩人。與李商隱齊名的「溫李」，即被視爲晚唐代表詩人的以溫庭筠爲首的晚唐三人，雖是代表當時的詩人們。但是，章孝標的生、歿年不詳，據說詩也僅「一卷」(《全唐詩》)。可說反倒是群小詩人之一人。竟也包括這樣的詩人，在此舉這四人，大概是根據日本那時代獨特的評價。

○口人作瑠璃台，苟定人階品，世不用之。

口人作琉璃台，假如定人的階品，世人也不用此。

「瑠璃台」是以琉璃裝飾的台。在〈詩境記〉的文脈中，是說在「詩境」製作這樣的底座。而其所指之意，則由與下句之關聯，推測在此可能是蓮座。令人想起藤原公任[12]的和歌理論、評論的書《和歌九品》，即是依據佛教的九品蓮台而成。我想是如此地將的詩人定等級，並評論其優劣。

作爲這樣性質的書籍，馬上令人想起在此之前也常常引用的梁、鍾嶸的《詩品》，當然在此是不符合的。若從此「記」之敘述順序來看，此處應爲晚唐，難道說在那時編述了類似性質的詩論書？在此，也因缺字妨礙了充分地理解，即使做如上述之推論，符合此之書現在也不存在了。

三、

一面弄清〈詩境記〉作爲典據的資料，一面就敘述中國詩史之展開做深入地考察。在各個時代，誰被推舉爲代表性的詩人，試整理之，則如次。

[12]藤原公任（FUJIWARA NO KINTOU）:平安中期的歌人。通稱四条大納言。後，出家。長於諸藝兼備詩、歌、管絃三船之才。撰有『和漢朗詠集』、『拾遺抄』等。（966~1041）。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漢－李陵

後漢－張衡

魏－文帝、曹植、王粲

晉－陸機、陸雲、潘岳、左思

[劉]宋－鮑照、薛道衡

梁－沈約

唐－上官儀、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陳子昂、杜甫

（近世）－白居易、元稹、章孝標、許渾、杜荀鶴、溫庭筠

這是根據大江匡房的評價。但是應該如何判斷之？欲使用其他的指標來驗證。

首先是圖書目錄。有兩種。藤原佐世於九世紀末所編纂的《日本国見在書目錄》[13]，爲當時的宮廷藏書目錄。其詩集被紀錄的詩人則如下。

曹植－魏曹植詩集三十卷

鮑照－鮑照集十卷

沈約－沈約集百卷、沈約八詠一卷

上官儀－上官儀集三十卷

王勃－王勃集三十卷、新注王勃集十四卷

楊炯－楊炯集三十卷

盧照鄰－盧照鄰集二十卷、幽憂子集十卷、盧昇之集一卷

駱賓王－駱賓王集十卷

陳子昂－陳子昂集

白居易－白氏文集七十卷、白氏長慶集

元稹－元氏長慶集二十五卷

藤原通憲[14] (1105~1159)是古代末期的代表性學者，也是藏書家，

[13]日本国見在書目錄(NIHONKOKU GENZAISHOMOKUROKU):書籍目錄。藤原佐世著。一卷。成於 891 年。分爲易、尙書、詩、禮、農、小說、兵家等四十類。記載當時現存日本的漢籍一五七九部一萬六七九零卷的書目。

[14]藤原通憲(FUJIWARA NO MICHINORI):平安後期的廷臣。官至少納言，以博學聞於世。薙髮後稱爲信西(SHINZEI)。參與後白河天皇的機密，有《本朝世紀》《日本紀注》等著作。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

留有《通憲入道藏書目錄》。在其目錄中記錄著四人的詩集。

王勃集一帖，白氏文集，章孝標集卷上，杜荀鶴集一卷

從目錄可以指出下面幾點。

在漢魏晉代，除了曹植，沒有詩集被紀錄。

初唐詩人則大體上有詩集。

《通憲入道藏書目錄》因是個人的藏書目錄，故中國詩集的記載較少，但是其中含有章孝標集、杜荀鶴集，此事值得注意。

其次，試觀察在日本古代的漢詩文中，這些詩人們是以什麼樣的人物被掌握，並表現出來。

李陵

被匈奴捕捉，懷著望鄉之情，歿於胡地。

李都尉思霜中動，班婕妤詞雪裏生。鄉國可迷霜一色，關河不限雪千程。

（菅原定義〈詩情被月催〉《教家摘句》）

文帝

「文章是經國之大業」的主要倡導人。同時也是舉行三月三日之曲水，九月九日的菊酒等風流韻事的人。

魏文帝所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者也。（菅原文時[15]〈封事三箇条〉《本朝文粹》[16]）

書巴字而知地勢，思魏文以翫風流。

（菅原道真〈三月三日同賦花時天似醉〉詩序，《菅家文草》）

尋旧跡於魏文，亦黃花助彭祖之術。

[15]菅原文時(SUGAWARA NO FUMITOKI):平安中期的學者，道真(MICHIZANE)之孫。以家學的文章道揚名遐邇，連源爲憲、大江匡衡等文人也請其斧正。(899-981)

[16]《本朝文粹》(HONCHOUMONZUI):平安中期的漢文集。十四卷。藤原明衡(FUJIWARA NO AKIHIRA)撰。將從嵯峨天皇的弘仁年間到後一条天皇的長元年間的名文詞四二七編，仿照《文選》的題裁分類、撰集爲三十九類。

（紀長谷雄〈九日侍宴觀賜群臣菊花〉詩序，《和漢朗詠集》[17]）

曹植

被認爲是詩才卓越的人。因此，有將擅長文才的親王比喻爲曹植之例。

陳子王之七步，縮為六焉。

（藤原行葛〈學生源元忠讚〉《本朝文粹》）

業只好文，則是曹子建之再誕

（大江朝綱[18]〈侍前鎮西都督大王読史記〉詩序，《本朝文粹》）

王粲

作爲〈登樓賦〉(《文選》) 的作者，被歌詠的都是跟此故事有關。

何必潘岳載星於河陽，王粲夜登於高楼。(島田忠臣〈就花枝〉詩序，《本朝文粹》)

陸機

〈文賦〉(《文選》) 的摘句被引用於《和漢朗詠集》《新撰朗詠集》[19]。大都是作爲文章出色之人的例子。又，這時與潘岳齊名的時候爲多。

左右方々，或斟陸機之詩濤，或謂潘岳之麗藻。

（《天徳詩合》[20]）

寄文學者，則酌潘江陸海之才。

---

[17]《和漢朗詠集(WAKANROUEISHUU)：詩歌集。藤原公任撰。二卷。取以白樂天、菅原文時等爲首的唐人、日本人的漢詩文之佳句五八八首（多爲七言二句），並附上紀貫之、柿本人麻呂等之和歌二一六首。分類爲春、夏、秋、冬、雜，供朗詠之用。以佳句麗藻之詩歌集廣爲人所愛讀。被認爲是成立於 1012 年(寬弘九年)。

[18]大江朝綱(OOE NO ASATSUNA):平安中期的學者、書法家，精通經史，因村上天皇的敕命，撰進《新國史》《坤元錄》。

[19]新撰朗詠集（SHINSENROUEISHUU)：詩歌集。上下二卷。藤原基俊（FUJIWARA NO MOTOTOSHI）著。仿《和漢朗詠集》編，收錄了適於朗詠的和漢詩歌。

[20]天徳詩合（TENTOKU UTAAWASE)：村上天皇於天德四年（960 年）三月三十日在清涼殿舉行的賽詩會。十二題二十番。成爲以後的盛典的賽詩會之模範。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惟宗孝言〈読晋書畢得山簡〉詩序，《本朝続文粋》[21]）

陸雲

以博學之人被歌詠的例子爲多。

陸龍伝學，故誇角立之才。

（惟宗孝言〈高文讃〉《本朝続文粋》）

潘岳

有許多例子，但幾乎是以〈秋興賦〉(《文選》) 的作者，且在歌詠秋思的文脈中被提出來。我想這是因爲歌詠「秋」這個季節的悲哀之情，是與日本人的感性吻合的緣故。

以出色的詩人來掌握的例子也有一些。但是都與陸機或謝靈運齊名（參看「陸機」項）。

另外還有成爲河陽縣之縣令，在縣中種花之事。又有說是絕世之美男子的例子。

吟詩相憶昔潘岳，乗酔還嘲楚屈原。

（藤原忠通[22]〈秋日林亭即事〉《本朝無題詩》）

陸生池柳合隣翫，潘令県桃分岸望。

（菅原定義〈隔水望花色〉《類聚句題抄》）

左思

用例極少。以〈招隱詩〉(《文選》) 的作者，又以出色的詩人與張

[21]本朝続文粋（HONCHOUZOKUMONZUI）:《本朝文粋》以後的有名詩文之撰集。十三卷。文二二九編、詩四編。撰者不詳。1140 年（保延六年）以後成立。

[22] 藤原忠通（FUJIWARA NO TADAMICHI）: 平安末期的廷臣。忠実（TADAZANE）之子。攝政關白、太政大臣。後，出家。入道法性寺之前，也稱爲關白太政大臣。性寬厚，盡孝悌之道，長於詩歌，書法亦成一家。被稱爲法性寺樣。著有詩集《法性寺關白集》。（1097-1164）

協齊名。

鮑照

用例只有一例。以出色的詩人之例子被舉出來。

薛道衡

用例只有二例。被拿來與盧思道做對照。

沈約

只有一例。

關於到[劉]宋代爲止的詩人則如上。各個詩人被詠入漢詩文的頻度，當然有多寡。潘岳有七十幾例，但是左思、鮑照、薛道衡、沈約卻非常少。而且，其提出方式也未必代表當代，即有時並非以優秀的詩人，而是因與其他故事有關而被提出。

至於唐代的詩人，則有很清楚的特徵。到[劉]宋代[應爲梁代]的沈約，即使是一例，也採納到漢詩文中。但是唐代的詩人則在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可看到駱賓王之名，這是唯一的例子，其他則完全不出現在詩文中。對此必須加但書，即白居易和元稹是例外。白居易帶給日本的詩文非常大的影響，因此其名被記載的情形很多。元稹是元白齊名的人物，故可以按白居易來看待。

若將此二人視爲特別來考慮時，唐代的詩人，除了駱賓王一例以外，皆沒有被採納到詩文中。這點則與漢魏六朝詩人呈現了鮮明的對照。

關於唐代的詩人，再來看其他的特徵點，一個是對於白居易、元稹作爲「近世」的詩人，將元白以後和那以前作區別。

在被區別的前半期所舉的詩人，除了杜甫以外，全都是初唐期的詩人。而且這些詩人已在前述的《日本国見在書目錄》被記錄了詩集。這或許是偶然的契合，但卻是頗有意思的事實。

作爲盛唐的詩人，則只有杜甫被舉出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章孝標以下的四人，我認爲是否與在日本所編纂的佳句撰集的入集情況有很深的關係。

一個是《千載佳句》，是成立於十世紀中頃的唐詩佳句集，各詩人的入集次數如下。

（1）白居易－517 （2）元稹－65 （3）許渾－33，

（4）章孝標－32 （5）杜荀鶴－19 （6）劉禹錫、楊巨源、溫庭筠－18。

上述白居易壓倒性的優勢也可以在此看清。此姑且不論，許渾、章孝標、杜荀鶴、溫庭筠四人，是僅次於白居易、元稹，佔著第三到第六位。

在以《千載佳句》作爲大量素材源的《和漢朗詠集》（藤原公任撰，十一世紀初成立）之中，也可看到同樣的傾向。

（1）白居易－135 （2）元稹－11 （3）許渾－10

（4）章孝標－7 （5）杜荀鶴、劉禹錫－4 （6）溫庭筠－3。

整體來看作品數雖然很少，但是四位詩人仍佔著上位。

在《千載佳句》和《和漢朗詠集》中，章孝標以下四位詩人的入集情況，與〈詩境記〉的記述是相關的。大江匡房有記錄其言談的《江談抄》，然而在《和漢朗詠集》的舊抄本添上的注記，是成爲此書的主要素材源之一，其中也包含以對章孝標、許渾、杜荀鶴的詩句之注記作爲根源的談話，匡房確實對《和漢朗詠集》所引的這些詩人之詩句抱持關心。若將此事合在一起考慮時，則對章孝標以下的中、晚唐詩人之評價，我以爲反映了《和漢朗詠集》、追溯到《千載佳句》這兩本在日本編纂的佳句詩集之受容情況。

四、

本論文中所敘述之要點如次。

大江匡房的〈詩境記〉是將「詩境」就「境」之字義，亦即虛構爲一個國家，並敘述在該「詩境」中，詩被制作情況的作品。然而其想法和結構，卻是仿照唐代王績的〈醉鄉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敘述詩之字義、起源和功用之部分，則幾乎仿照〈毛詩序〉。

構成〈詩境記〉中心的是，記述始自《詩經》迄於晚唐的中國詩史之展開。因此，可以將此作品視爲古代日本之一知識分子所寫的中國略詩史。

從《詩經》到晉代，借用了《文心雕龍》、〈詩品序〉、〈宋書謝靈運傳論〉等之文學論書之記述。

至於在時代上接近大江匡房的中、晚唐之四位詩人，我認爲與在日本所編纂的兩本佳句詩集之受容應有的狀態，有很深的關係。

※原文無註釋，通篇註釋係由譯者所加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